

唐代的贱民

武建国

唐代的贱民是唐代社会经济、阶级结构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本文就唐代贱民的等级、来源、数量、隶属、服役,以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差异特点等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通过等级的形式表现阶级的差异,这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列宁指出:“大家知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所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农奴制社会)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①唐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就是由各种社会地位的多级的阶梯构成的,并且从法律上确定了每个阶梯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阶级差别固定化。唐代贱民是唐帝国整个阶梯中最低的一层。贱民又分为官贱民和私贱民两大类:官贱民有官奴婢、官户、工乐户、杂户和太常音声人;私贱民有奴婢、部曲、客女、随身。而在这贱民层中又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依据奴婢“一免为番户(即官户——引者),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②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三个不同的等级,即官私奴婢——官户、工乐户、部曲、客女、随身——杂户、太常音声人。下面就其等级秩序分别述之。

一、官私奴婢

奴婢是唐代贱民阶层中身份最低的一个等级,不与人同,则“律比畜产”^③,“同于资财”^④。

唐代奴婢的来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一,继承前期世代相承的奴婢;二,以战俘为奴。这主要是在前期;三,掠买良人为奴。如“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买”^⑤,“京畿之内,掠夺颇多,遂令黔首,徒被丹书之辱”^⑥;四,自卖为奴。这特别是在征敛苛重和灾荒年间,“岁饥,家室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⑦;五,债务奴婢。如“越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⑧;六,罪没为奴。唐代律令规定:“凡叛逆相坐,没其家配官曹,长役为官奴婢”^⑨。

唐代奴婢的来源与前代相差无几,只是逐渐受到限制。世代相承的奴婢,南北朝以来已

不断放免，尤以北周武帝时为最盛。隋末农民战争中，许多奴婢摆脱了奴婢地位而成为良人。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了隋王朝怎样在农民、奴婢反抗斗争的打击下分崩离析直至灭亡，因此比较注意缓和阶级矛盾。尤其是在唐太宗时，对战俘不再承袭前代“沦为贱种，类为皂隶”的旧制，而经常放免为良。如贞观十九年八月攻高丽，“诸军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悯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⑩直至唐末仍有放战俘为良的情况，昭宗“龙纪二年正月，赐两军金帛，赎所略男女还其家。”^⑪而对于私掠战俘为奴者，则以死刑处罚，“广州都督党仁弘，……交通豪酋，纳金宝，没降獠为奴婢。既还，有舟七十。或告其赃，法当死。帝哀其老且有功，因贷为庶人。”^⑫对于掠卖良人为奴者，唐律以处绞刑而严格禁止，“诸略人略卖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⑬。虽然在禁令下，仍有不少地主官吏等违法掠卖良人，但必竟是不合法的，只有那些趋利而不惜命者才敢为之。而自卖为奴者，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现，农民是不愿弃良从贱的。再则，由于奴婢生产愈益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奴婢不断的反抗斗争，迫使封建国家、官吏、地主不断放免奴婢。在正常情况下，奴婢年逾“六十以上及废疾者为官户，七十为良人”^⑭。所有这些，使唐代奴婢的数量比起前代日益减少。

官奴婢隶属刑部，由刑部四司之一的都官总监，“都官郎中员外郎，掌配没隶，簿录俘囚，以给衣粮药疗，以理诉免，凡公私贱民，必周之。”^⑮然刑部都官仅掌奴婢簿籍，直接管理和役使的却是诸司，奴婢“凡初配没，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配司农”^⑯，“惟诸司用奴时，可由司农寺拨给”^⑰。也有一些奴婢附贯州县，“附贯州县者按比如平民”^⑱。官奴婢成丁的年龄皆早于一般良人，“四岁以上为小，十一以上为中，二十以上为丁”^⑲，而唐代中男丁男之制，天宝三年以前十六岁起算中男，二十一岁起算丁男，此后，十八岁起算中男，二十三岁起算丁男，广德元年又改为二十五岁起算丁男。奴婢的簿籍每年一编造，“每岁孟春，本司以类相纵，从而疏其籍以申，每岁仲冬之月条其生息，阅其老幼，而正簿焉。每年十月，所司自黄口已上并印臂送都官阅貌。”^⑳造籍一式二份，“一通送尚书，一通留本司”^㉑。官奴婢的生活资料皆由官曹供给（其数量详见《唐六典》卷六刑部都官条）。私奴婢则完全隶属私人所有，如同私有财产一样。律云“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㉒，“随主属贯，又别无户籍”^㉓。此外，寺观亦拥有奴婢。至武宗灭佛时还籍没寺观大量奴婢为两税户，“武宗即位，废浮图法，……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㉔

唐代奴婢的役使状况是比较复杂的。但可以肯定，奴婢已主要不用在农业生产上。从官府来说，国家的屯田，唐中叶以前，边地主要是以兵士，谪发罪吏为戍兵进行屯种。内地的屯田则由兵士和调发丁夫耕种，开元时李元絳说：“若置屯则须公私相易，调发丁夫，调役则业废于家，免庸则赋阙于国”^㉕。安史之乱后，屯田逐渐出租于民耕种，建中八年京兆尹严郢上奏中言：“况二千余里发人出屯田，一岁方替，其粮谷从太原转饷漕运，价值至多。又每岁人须给钱六百三十，米七斛二斗，……与天宝以前屯田事殊”^㉖。国家的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㉗。公廨田亦“借民佃耕，秋冬受数”^㉘。所以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一般是不用奴婢耕种的。官奴婢主要用于手工业生产和服杂役。有工能者，“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

掖庭”，从事手工业生产。而“其无能者咸配司农”服杂役。

私家奴婢的役使比官府繁杂，但主要是用于家内役使。虽然奴婢用于耕作的亦有不少记载，但是私家奴婢用在生产劳动上的是少数。其原因：一是奴隶制生产是落后的生产形式。以“附贯州县者按比如平民”的奴婢为例，其不上番所纳资课比一般农民少一千文。一般丁男纳资代役为二千五百文^②，而丁奴仅纳一千五百文^③。这反映了奴婢恶劣的生产条件，使其没有劳动积极性，他们所能创造的产品比一般农民低。而剥削者，总是企图榨取更多的财富。斯大林指出：“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兴趣。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对劳动不感兴趣，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④无疑，唐代地主阶级也必然遵循这一规律，选择能提供更多剥削量的剥削形式。实际上，唐代从前朝开始，大地主们主要采取的剥削形式就是庇荫流亡的破产农民和出租土地。唐代客户之多，政府括户之众以及租佃制的不断发展正反映了这一状况。二是政府规定官吏私人占有奴婢的数量比前代大大减少。“武后大足元年，限制王公以下，奴婢多者二十人，少者一人”^⑤，玄宗时又重申：“王公之家不得过二十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⑥。这与北齐私家拥有奴婢“亲王三百人，……庶人限止六十人”^⑦相比已大大减少。当然，许多官吏地主拥有奴婢的数量往往超过这些限数。但由此也反映出，政府规定官吏所可拥有的奴婢，主要是供家内役使，并不是用于生产。所以唐律云：“部曲奴婢，事为家仆，事主须存谨敬。”^⑧奴隶生产制逐渐退出生产领域的状况已反映在国家的律令上，说明在唐代社会现实生活中，使用奴婢从事耕作的事实已不多。恩格斯在谈到罗马奴隶制崩溃之后的情况时曾说：“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用的奴隶，还停留在社会上”^⑨。唐代存在的奴婢，基本上也属于这类情况。奴婢除了主要服杂役外，其骁勇者，也常被充入军队征战，如“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九月敕，士庶僮仆有骁勇者，官酬主直，并令讨击契丹”^⑩。

不过，唐代奴婢存在的数量与使用状况，内地与边地是有差异的。内地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经济的不断强化，奴婢存在的数量日益减少，很少直接用于生产上。而边地则与各少数民族接壤，因受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关系的影响，奴婢的数量和用于生产上的情况有逾于内地。如“岭南诸州，居民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估之高下。窘迫求售，号哭逾时，为吏者，谓南方之风俗，风习为常，恬然不怪，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物，俱为货财”^⑪，武则天“大足元年五月三日敕：西北沿边州县，不得畜突厥奴婢”^⑫。边地的农民也以拥有千奴万婢作为富裕的象征。敦煌石室所出唐人《下女词》中曰：“况（祝）愿新郎……千奴万婢”^⑬。

《下女词》又云：“汉奴专知仓库，胡奴检校牛养，斤脚奴装鞍接镫。强壮奴使力耕荒，孝顺奴盘鸡炙旌，谄韶奴点醋行姜。端正奴拍篋送酒，丑掘奴添酥酪浆，细腰婢唱歌作舞”。^⑭可见奴婢不仅名目繁多，而且从各种家内劳动到工农业生产，都使用奴婢。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边地与内地的差异，是应该注意的，不能一概而论。

唐代奴婢的性质,具有奴隶与农奴的两重特征。他们与奴隶社会的奴婢有相一致的一面。人身被他人所占有。婚姻由主人决定,并且只能当色相婚。未经放免,子孙世为奴婢。刑法上亦重于社会其他各等级,这在《唐律疏议》中比比皆是。奴婢被国家和私人作为资财赏赐、赠送,如李靖受诏讨平辅公祐“赐物千段,奴婢百口”^②,私赠如:“裴宽尚书罢郡,西归汴中,日晚维舟,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敝,召与语,大奇之,……举船钱、奴婢与之”^③。奴婢亦可被当作财物买卖,与牛马同市,“诸买卖奴婢马牛骡驢,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④官府奴婢还铭有印记,以别卑贱。这些都说明了唐代奴婢的身份与奴隶制下的奴隶是一致的,“奴隶在这里也同役畜一样,并不形成特殊的经济范畴,或者,最多也只是存在物质上的差别:不会说话的工具;有感觉的,会说话的工具。”^⑤

但是,唐代奴婢与奴隶制下的奴隶又有着一些差异。斯大林指出:“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⑥然在唐代,主人已不能随意杀奴婢,即使罪杀奴婢,也要报申官司,“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⑦其次,奴婢不再终身为奴,而“六十以上及废疾者为官户,七十为良人”。再次,奴婢已有私有财产,唐律云:“其部曲奴婢应征赃赎者,皆征部曲及奴婢,不合征主。”^⑧奴婢可以以钱赎罪,反映了奴婢具有私有财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附贯州县的奴婢,“附贯州县者按比如平民,不番上,岁督丁资为钱一千五百文。丁婢中男五输其一,侍丁残疾半输,……丁奴三当二役,中奴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⑨。奴婢所交代役钱,虽然少于一般良人,但说明他们已是拥有私有财产之人,而且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他们的生产活动也已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还享有如同平民不上番而纳资代役的待遇。他们与人身为主人占有,“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⑩奴隶,有着明显的差别,与直接隶属于官府和私家的奴婢也不同,说明他们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奴婢了。唐代奴婢与奴隶制下的奴隶既有相一致的一面,又有差异的一面,这一特征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奴婢的特点。

二、官户、工乐、部曲、客女

官户、工乐、部曲、客女,为唐代社会同一等级,“官户与部曲同”^⑪,“若工乐官户,不附州县贯者,与部曲例同”^⑫,“称部曲者客女同”^⑬。所不同是,官户、工乐隶属国家,部曲、客女隶属私家。

官户,依唐律所云:“官户者,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⑭,即官户是承袭前代和唐代配没而来的。官户不始于唐,为延袭北周“官口”而来。北周武帝建德元年十月庚申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⑮。官口与官户都属贱民,只是到了唐代改称“官口”为“官户”。此外,唐代官户还有一个来源,即放奴为官户。依律令规定,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注云: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⑯。奴婢若依次放免,则一免便入官户之伍。

官户,“州县无贯,唯属本司”,^⑤直接隶属于其服役的各部门。总其籍者为刑部都官。官户被役使的状况与官奴婢基本上是一致的。“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⑥,而无能者咸归司农。官户服役,一般为一岁三番役,若不上番,可纳资代役,“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以上当番,请纳资亦听之。”^⑦但也有被留作长上无番者。官户还是工乐户的经常补充,“官户皆在本司分番,每年十月都官按比,男年十三以上,在外州者十五以上,容貌端正送大乐,十六以上送鼓吹及少府教习”^⑧。可见,唐代工乐与官户的关系比较紧密,工乐中大量的都是由官户转化而来。官户依令受有田地,“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⑨。唐代丁男口分田为八十亩,官户应受四十亩。这四十亩田地,当是给官户自营为生的,因为他们除上番以外,不再交纳其它的赋税,而这四十亩田地也仅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长役无番的官户,衣食均有官司发给,“给户奴婢、番户、杂户资粮衣服”^⑩。

工乐也直系官府,“工乐者,工属少府,乐属太常,并不贯州县”^⑪。工乐名目,北魏已有,唐代亦继承旧制。配隶的工户是唐代官府作坊中工匠的一个来源,他们的身份与政府征发服役的丁匠是有异的。凡配隶之人,入少府监者,便身为工户。入太常寺为乐工者,便系为乐户。故工乐户属贱民之列。

部曲,主要隶属私家。“奴婢部曲,身系于主”^⑫,“部曲为私家所有”^⑬。此外,寺观也拥有部曲,故唐律中规定:“观寺部曲殴当观寺道士女冠僧尼等各合徒一年”^⑭。唐代的部曲主要有二种:其一,是承袭南北朝以来的部曲;其二,是奴婢放免为部曲。奴婢放免为部曲,盖始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一月诏:“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其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⑮。唐代依然如故,私家奴婢放免则为部曲、客女。依唐律规定,部曲也只能是释放的奴婢或部曲子孙。如果略卖、和诱、典质良人为部曲,其罪仅次于略良人为奴者一等^⑯。部曲,在汉代本来只是军队编制的名称。魏晋以来,部曲乃是家兵,亦即私人武装组织,同时也是农业生产劳动者。但从北魏以降,部曲逐渐演变为主要供家内役使。自北魏隋唐的均田令中,均无部曲受田的令式。唐代令文也规定私家贱口不给田地,“凡官户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贱口……口分永业不与焉”^⑰。这说明,在唐代部曲已主要供家内役使,而不是用于生产劳动。故《唐律疏议》云:“奴婢部曲,是为家仆”。不过,私家役使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主要服家内杂役外,有的主人还用部曲为已营商,“诸公主及官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客部曲等在市兴贩”^⑱。有的也仍然以部曲作为私人武装征战,尤其是在战乱之时,如“(仆固)怀恩将士,皆(郭)子仪部曲”^⑲。所以,唐代部曲仍保有魏晋时期作为私兵役使的遗迹。

客女,“谓部曲之女”,他们“或于他处转得,或放婢为之”^⑳。《唐律疏议》王元亮释文云:“婢,经放为良,并出妻者,名为客女”^㉑。客女之名始于北周,唐代则是承袭相循。客女的身份与部曲是例同的,也主要用于家内役使。此外,还有“随身”,“部曲奴婢客女随身,此等律有明文加减,并不同良人之例”^㉒。随身不属良人,但随身乃由雇赁而来,“二面断约年月,赁人指使为随身”^㉓。所以随身是暂时的,有一定的期限,限期一满,可摆脱贱民地

位而复为良人。

官户、工乐、部曲、客女，他们是依附性极强的一个等级，其地位只是略高于奴婢。官户、工乐都只能当色相婚，“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相婚”^⑤。在刑法上，殴良人加凡人一等处罪，良人殴官户则减一等处罪。官户与官奴婢所不同的是可以授田四十亩，一般一年服役三番，并可以纳资代役，在经济和生产活动方面普遍地较奴婢有略多的自由。然而这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中不少人也常是长役无番。部曲、客女在律令中常和奴婢并称。虽然法律上规定，奴婢同资财而“部曲不同资财”^⑥，亦不准买卖，“奴婢有价，部曲转事无估”^⑦。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是被视作私人财产。若主人犯法处斩，则其“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⑧，部曲和资财田宅并称，并一同被没官，这就是视部曲如同私人财产。虽然部曲不准买卖，但“转易部曲事人，听量酬衣食之直”^⑨，这同买卖奴婢也没有多少差异。所不同的仅仅是奴婢有市价，而部曲的价格由买卖者双方自己商定而已。从实质上来讲，他们都象商品一样，可以从一个卖主手中转易到另一个买主手中。部曲在刑法上，许多地方也是同奴婢一致的，如“诸部曲奴婢冒旧主者徒二年，殴者流二千里，伤者绞，杀者皆斩”^⑩，“诸部曲奴婢，过失杀主者绞，伤及冒者流”^⑪。部曲不同于奴婢者，在法律上最明显的只有二条：其一，部曲可娶良人为妻，“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⑫。其二，“部曲合有资财”^⑬。由以上观之，唐代部曲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奴婢是很近似的。

三、杂户、太常音声人

杂户和太常音声人，都隶属于国家。杂户之名，不独见于唐代。北魏时已有“杂户”之称，《左传》襄公二十年孔颖达疏引《魏律》云：“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⑭。北朝杂户的身份低于一般良人，还可以从北周时期释杂户为民得证。北周武帝建德六年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剥”^⑮，“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⑯。从诏令来看，似乎周武帝悉放杂户为民，取消配杂之科后，杂户不再存在，然实际上杂户并未自此而绝。唐代杂户中有一部分就是前代犯罪没官而承袭下来的，唐律云：“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⑰。此外，唐代杂户的另一来源，就是由官户放免为杂户者。

杂户，“附州县户贯”^⑱，服役于各司。役次为“一年五番”，即一年二个半月，比官户少半个月。不上番，可以纳资代役。杂户“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⑲。按唐代受田数可以应受百亩田地。在经济条件上，杂户优越于其他贱民。当然，他们并不能完全依律令所规定的数量受足田地。因为唐代均田户尚不能受足，杂户自然也不可能受足。从受田和服役的时间来看，杂户的主要劳动形式，已由服杂役转向以农业生产为主，在土地上的经营活动已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或者说土地已成了他们维持贫困生活所需生活资料的主要源泉。在法律上除杂户当色相婚，良人不准养杂户子孙的条例体现了其贱民身份外，其它则一同良人之例，“其有反逆及应缘坐，亦与百姓无别”，而“工乐官户不附贯州县者，与部曲例同”^⑳，所

以杂户无论从经济条件还是社会地位,与他其贱民(除太常音声人)已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已接近一般良人。杂户与官户虽然只差一个等级,但这一等级的实际差别是比较大的。

太常音声人,是封建国家中专门从事音乐工作的人。他们的身份属于贱民之列,主要是罪没入官者。这也是沿袭前代旧制。但唐代的太常音声人不是前代承袭而来,而是本朝配隶之人。唐武德四年曾下诏:“太常乐人,本因罪谴没入官者,艺比伶官,前代以来,转相承袭。或有衣冠继绪,公卿子孙,一沾此色,累世不改。婚姻绝于士庶,名籍异于编氓。……其太常鼓吹诸旧乐人,年月已久,时代迁移,宜并蠲除,一同民伍。……自武德元年配充乐户者,不在此例”^④。太常音声人,旧不属州县,由太常寺直接管辖。自隋义宁以后才附贯州县,“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以来,得於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⑤。唐因隋制,太常音声人仍附贯州县,唯属太常寺驱使。太常音声人一般都要经过教习而正式成为乐人,“凡习乐,立师以教,而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三等,以上礼部。十年大校,未成则五年而校,以番上下”^⑥。太常音声人服役分番上下依离京城远近而有异,“关外诸州者分为六番,关内五番,京兆府四番,并一月上。一千五百里外,两番并上,六番者上日教至申时,四番者上日教至五时”^⑦。若不上番可纳资代役,“岁二千文”^⑧。唐初太常音声人尚只有二百余人,“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诏诸州散乐、太常上者,留二百二人,余并放免”^⑨,以后又逐渐增多,“短番散乐一千人,诸州有定数,长上散乐一百人,太常自访召”^⑩。太常音声人“名附县贯,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⑪,而赋役不同州县,他们除了分番服役外,不再负担其他杂役,并且是一人服役,举家皆免差役,“神龙三年八月,敕太常乐鼓吹,散乐音声人,并是诸色供奉,及祭祀陈设,严警卤簿等用,须有矜恤,宜免征徭杂科”^⑫。正是由于太常音声人的负担较其他贱民要轻,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到唐中叶以后,逐渐发展成富饶之户,会昌二年敕:“京畿诸县太常乐人及金吾角子,皆是富饶之户,其数至多,今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今日已后,只放一身差使,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⑬。可是,他们好景不长,封建统治者是不会让他们真正富饶起来的,而他们中原来生活条件没有多大改善之家,则又随之而加重了负担。太常音声人,在唐代贱民层中是最上的一个等级,除以上所述在经济地位上接近于良人外,在法律上,他们也“依令婚同百姓”^⑭。

以上所述官私奴婢、官户、工乐户、部曲、客女及杂户、太常音声人等构成唐代的“贱民”,他们中虽然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各自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所差异,但未经放免皆不能从良,换句话说,在社会上还没有真正的人的地位,是人下之奴仆。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当时社会受奴役和压迫最深、受剥削最惨重的劳动者。他们只能在法律严格限定的一定地位中生活,不能越雷池一步,稍有逾越,则要遭受残酷的处罚。唐代贱民阶层的存在,是唐帝国生产关系中最阴暗、最落后的一面,阻碍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经济总是要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在整个唐代,被统治者称为“贱民”的劳动大众,为摆脱非人的处境,以各种形式同剥夺者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反抗斗争,迫使统治者不得不经常放免为良,以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这当是唐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

注 释

-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注。
- ②⑥① 《唐六典》卷6 刑部尚书条。
- ③④⑤⑥⑦⑧ 《唐律疏议》卷6。
- ④⑤⑥⑦⑧⑨ 《唐律疏议》卷3。
- ⑤ 《新唐书·张廷珪传》。
- ⑥ 《唐大诏令集》卷5。
- ⑦⑧⑨ 《新唐书·食货志》。
- ⑧ 《旧唐书·柳宗元传》。
- ⑨⑩⑪⑫⑬ 《新唐书》卷46 《百官志》。
- ⑩ 《资治通鉴》卷198。
- ⑪ 《新唐书·昭宗本纪》。
- ⑫ 《新唐书·刑法志》。
- ⑬⑭⑮⑯⑰ 《唐律疏议》卷20。
- ⑭⑮⑯⑰⑱ 《新唐书》卷48 《百官志》。
- ⑮⑯⑰⑱⑲⑳ 《唐六典》卷6 刑部都官条。
- ㉑⑳㉒㉓ 《唐会要》卷86 《奴婢》。
- ㉔⑳㉕㉖ 《唐律疏议》卷14。
- ㉗ 《唐律疏议》释文卷12。
- ㉘ 《新唐书·李元纁传》。
- ㉙ 《唐会要》卷89 《疏凿利人》。
- ㉚㉛ 《通典》卷35 《职田、公廨田》。
- ㉜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650—651页。
- ㉝ 《文献通考》卷11。
- ㉞ 《隋书·食货表》。
- ㉟㊱㊲ 《唐律疏议》卷22。
- 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46页。
- ㊴ 《唐大诏令集》卷109。
- ㊵㊶ 刘半农:《敦煌琐瑣》,转引自张勋燎《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载《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 ㊷ 《新唐书·李靖传》。
- ㊸ 《唐语林》卷3。
- ㊹ 《唐律疏议》卷26。
- 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541页。
- ㊻ 《列宁主义问题》第650页。
- 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 ㊽㊾㊿①②③④⑤ 《唐律疏议》卷17。
- ⑥⑦⑧⑨ 《唐律疏议》卷12。

- ⑤⑥ 《周书》卷5《武帝纪上》。
- ⑥⑦ 《新唐书》卷49《百官志》。
- ⑥⑦⑧ 《周书》卷6《武帝纪下》。
- ⑥⑨ 《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
- ⑦⑩ 《唐令拾遗》卷857。
- ⑦⑪ 《旧唐书·仆固怀恩传》。
- ⑦⑬⑭⑮ 《唐律疏议》释文卷22。
- ⑦⑯ 《唐律疏议》卷25。
- ⑧⑰ 《唐律疏议》卷2。
- ⑧⑱ 《唐律疏议》卷23。
- ⑧⑲ 转引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229页。
- ⑧⑳ 《隋书·刑法志》。
- ⑨⑱⑲ 《唐会要》卷34《杂录》。
- ⑨⑳⑲ 《唐六典》卷14太常寺。
- ⑨⑲⑲ 《唐会要》卷33《教乐》。